

【经济学人】

高鸿业与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

徐秋慧

(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,北京 100048)

【摘 要】 高鸿业是国内最早讲授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。他晚年重译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，并撰写了《一本拯救资本主义的著作——解读〈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〉》，在凯恩斯经济学研究领域独占鳌头。本文探讨了高鸿业讲授、译介和研究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的教育实践和学术成果，按照高鸿业的解读将《通论》进行了全面讨论，这将有助于改进我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，创新和发展现代经济理论。

【关键词】 高鸿业；讲授《通论》；翻译《通论》；解读《通论》

【中图分类号】F093

【文献标识码】A

【文章编号】1000-971X(2011)04-0157-05

高鸿业(1911-2007)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、著名经济学家和资深翻译家。他长期在人民大学讲授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(以下简称《通论》)，晚年时又重译了《通论》，撰写了《一本拯救资本主义的著作——解读〈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〉》，是我国凯恩斯经济学研究领域中执牛耳者。探讨高鸿业讲授、译介和研究《通论》的教育实践和学术成果，对于改进我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，创新和发展现代经济理论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一、高鸿业讲授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

高鸿业是在美国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，当了一年副教授后，于1957年春天回国的。当时国内大学只讲授马克思经济学，西方经济理论统统被斥为“庸俗经济学”停开了。所幸的是，没有过多长时间，中国人民大学(还有北京大学)又以“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”的名义，重新开设西方经济理论课程，并由他主讲。此后，在三尺讲台上，高鸿业默默奉献了整整50年，为不计其数的本科学生和数以百计的硕士生、博士生讲授凯恩斯经济学(以及新古典经济学)，形成了一整套经济学教育理念和教学经验。

首先，关于讲授凯恩斯经济学的目的。高鸿业认为，凯恩斯经济学同全部西方经济理论一样，本质

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，其主要功能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；同时，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总结了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，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可资借鉴之处。因此，在讲授凯恩斯经济学时，既不能视凯恩斯经济学为异端，持全盘否定态度；也不能视凯恩斯经济学为正宗，持全盘肯定态度。正确的态度是，在整个理论体系上，对凯恩斯经济学持否定态度，而在具体的概念、论点和方法层次上，有所借鉴。要通过教授凯恩斯经济学，使中国的学生，既能识别凯恩斯经济学意识形态层次的有害之处，又能借鉴和运用其对我有用之处，最终达到“去其糟粕、取其精华”，“为我所用”的目的。^[1]实践证明，高鸿业的这种经济学教育思想是完全正确的，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对大学教育的客观要求。

其次，关于讲授凯恩斯经济学的要求。高鸿业在论述经济理论教学内容时指出，经济理论(包括凯恩斯经济学)一般有三个层次^[2]：(1)“论文层次”。这个层次的理论观点主要出现在专业期刊中，一般是原创性的，专业性很强，比较难读懂。其读者对象是专业理论人员，包括博士研究生。凯恩斯在出版《通论》之前，就发表了大量相关论文。(2)“专著层次”。论文层次的观点，经过较长时间

【作者简介】徐秋慧(1971-)，女，山东寿光人，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讲师、博士。主要研究方向：现代经济学。

的检验、整理、归纳和总结,并系统地表达出来,就成为学术专著。这是长期学术积累的结果。其读者对象,除了专业理论人员外,也包括本科高年级学生、研究生和其他经济学工作者。《通论》就是这样一本经典专著。(3)“教科书层次”。专著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检验后,其中那些被社会广泛接受的观点,首先进入中级经济学教材,最终进入初级经济学教材。初级经济学教材,其读者对象主要是本科学生。据此,高鸿业主编了《西方经济学》(其宏观部分即凯恩斯经济学),供本科学生教学使用。重新翻译了《通论》并撰写了《解读〈通论〉》,供研究生教学使用。

最后,关于讲授凯恩斯经济学的方法。高鸿业认为^[3],中国人学习凯恩斯经济学,目的是“洋为中用”,服务于国内现代化建设。其前提与基础是对凯恩斯经济学的系统了解和详尽研究。为此,他指出研究生必须阅读《通论》等经济学原著,不用或少用二手材料。同时对《通论》等进行必要的分析和评价。其中,主要是把握好三个不同层次的区分:一是把《通论》中的一般理论,即有关意识形态的部分与纯技术的内容加以区分;二是把《通论》的整个体系与其中的某些观点、概念和方法加以区分;三是把《通论》的某些论点、概念和方法本身与西方经济学家对它们的解释和运用加以区分。

此外,高鸿业还特别强调,经济学教育和研究,要密切联系中国的现实。他说,理论联系实际是做学术研究的核心。所谓学术,是为了解决实践问题而存在的,不能直接或间接解决问题的学术研究,毫无意义。学术本身来自实践。没有经济现象,就没有经济学。

二、高鸿业翻译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

(一)关于《通论》的重译

1996年,77岁高龄的高鸿业承担国家教委人文与社会科学博士点研究项目,重译《通论》,1998年译毕。199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
高鸿业在《译者导读》中指出^[1],他之所以接手这个课题,重译《通论》,是基于以下考虑:

1.《通论》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

学界普遍认为,《通论》对世界的重要性,可以同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、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等量齐观。

凯恩斯本人不仅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,也被置于像亚当·斯密那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家行列,还被誉为像马克思、达尔文、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那样,属于最具创新性的宏伟层次上的思想家。从1936年《通论》出版以来,凯恩斯经济学就成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2.《通论》是一部难于读懂的著作

凯恩斯有思想,但《通论》的文字非常晦涩,结构安排也很凌乱,有时他还故弄玄虚,再加上正反观点交织在一起,致使《通论》成为最难懂的著作之一。如果没有相当的专业基础和极大的耐心,读懂《通论》是非常困难的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曾坦承,他最初阅读《通论》时,确实没有读懂。他还断言,在该书出版后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内,在麻省剑桥没有任何人真正知道该书写的是什么。

3.《通论》的初译本风格已经过时

早在1957年,徐毓枬先生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中译本。虽然其翻译信度无可挑剔,但写作风格是30年代通行的半文言、半白话。现在的读者多数已经不懂文言,也不习惯于文白夹杂的表述方式。这样的行文方式加剧了读者阅读难度,影响了《通论》的传播。这也是商务印书馆决定重译《通论》的原因之一。

同徐译本相比,高鸿业除了用标准的现代汉语,准确、通顺、优雅地重译了《通论》全书外,还精心撰写了一篇约2.6万字的《译者导读》和122条、约1.4万字的“译者注”。高鸿业在解释他如此安排的初衷时指出,撰写《译者导读》是想全面说明《通论》,撰写“译者注”则是想解释《通论》中的晦涩难懂之处,两者目的都是帮助读者读懂原著。另外,他还试图表明,在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时,对原著添增适当的译者评注,是有必要的。^[1]严复在节译《国富论》时有过类似的做法。

(二)《译者导读》的内容

在后来出版的《解读〈通论〉》中有更详尽的说明,拟留待第三节讨论。这里着重考察“译者注”的主要内容。“译者注”有长有短,短的只有几个字,长的则上千言,俨然一篇短文。^[1]粗略归纳,大体上分为以下6类:

1.纠正或指出原著中的错误

尽管《通论》是巨著,但其中也免不了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。例如,原著论述庇古教授的就业乘数时,将 $\Delta(x+y) = k' \Delta y$,误写成 $\Delta x = k' \Delta y$,致使前后文脱节。高鸿业推测可能是原文印刷出了问题,便进行了改正。再如,关于 $I = S$,到底是事先的,还是事后的,凯恩斯当时并没有弄明白,当然在书中也没有讲清楚,因而在西方经济学界造成了混乱。后来经过汉森等人的研究,这个问题才最终得以澄清。“译者注”对此进行了较详细地说明。

2. 补充省略的内容

《通论》是凯恩斯写给同行经济学者看的。他假定读者已经有了足够的理论知识,因而有些地方写得非常简约,省略了许多中间环节和铺垫内容。尤其是一些重要原理或数学公式,他没有进行必要的推导或证明。这对读者来说,平添了阅读和理解难度。针对这些问题,“译者注”尽可能地补充了省略的理论内容和公式推导。其中,补充的理论内容有:古典劳动市场模型、国民收入的三个定义式、狄拉德需求模型等;补充的公式推导有: $p = F(o_r)$ 、国民收入的定义式、 $k = k'$ 、投资量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、利息率水平与利息率波动幅度之间的关系 ϕ'
$$(x) = \frac{k'}{k' - 1} \approx 1 + \frac{1}{k'} \cdot \frac{1 - e_{or}}{e_{er}} = - \frac{N_r \phi''(N_r)}{p_{wr} \{ \phi'(N_r) \}^2} \cdot \frac{Md_p}{pdM}$$
$$= e_p \cdot e_d \text{ 等。}$$
这些“译者注”分量都较大,有的多达八九百字。数学公式推导涉及大量的高等数学,有相当的难度。

3. 解释概念

《通论》出版已经半个多世纪了。有些当时通行的概念现在已经不用了,如工资品、“纯”利息率等;有些概念则有了新的表述,如使用者成本现在叫收入,工资单位现在叫平均工资,流动性现在专指货币等。《通论》还使用了一些其他学科或经济生活中的术语,如“限雇原则”、“多头”、“空头”等;另外,凯恩斯还自己定义了一些术语。例如,凯恩斯所说的古典经济学、新古典经济学等术语,既不同于马克思的说法,也不同于西方多数经济学者的说法。再如,他把活期存款或现钞称为“具有瞬时流动性的支配权”,而把股票、债券等不能立即用于购买商品的票据,叫做“放弃瞬时流动性的支配权”,等等。对于此类术语,“译者注”都做了适当说明。

4. 概括句子或段落的内容

《通论》中有些句子过长,段落内容混乱,读者难于理解。“译者注”对其进行了适当解释或概括。例如,在《通论》罗列基本命题的段落,“译者注”指出,“这也就是一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‘简单凯恩斯模型’”。再如,“这里的负投资大致可以理解为一般所说的折旧,但按照凯恩斯的意思并不完全等同于折旧。”此外,“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是:……”,“这里的意思是:……”,“这就是……”等,都是概括性解释。《通论》中此种类型的“译者注”最多,对理解原著颇有益处。

5. 提示章节之间的联系或阅读时应注意的问题

《通论》的框架结构比较凌乱,章节内容衔接有跳跃性,初学者不易把握其内在逻辑。例如,《通论》的主要思路是从第一篇直接到第三篇,读者如果跳过第二篇不会对以后的阅读造成很大影响。“译者注”对此作了提示。再如,第四章的内容,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,与全书的内容和结论没有多大关系。“译者注”也作了说明。此外,第五章讨论预期对经济变量的影响,但凯恩斯对预期的论述相当散漫和凌乱,也没有得出系统性的结论。第六章国民收入一节当时有意义,现在已经没有必要,读者如果略去这一节,不会影响以后的阅读。第十四章讨论的“可贷资金利息论”,对初学者似乎没有加以深究的必要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克莱因的《凯恩斯的革命》。对上述内容,“译者注”都给出了说明。

6. 解释典故

《通论》中有些典故,著者没有说明,“译者注”给出了解释。例如,在第十三章,凯恩斯把传统经济学家比喻为“甘迪德”。甘迪德是伏尔泰在哲学讽刺故事中塑造的一个人物。“译者注”做了说明。此类“译者注”显示了译者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人文底蕴。

高鸿业在谈及翻译萨缪尔森《经济学》经验时说,“译文应尽量使读者看懂,至少应使有关专业的读者看懂。也就是说,译文要符合严复提出的‘信、达、雅’中‘达’字的要求”。^[4]至于译文要准确,不歪曲,不遗漏,不随意增减意思,在高鸿业看来,是不言而喻的。所以,他总是在坚持“信”的前提下,极力追求“达”的境界。在翻译《通论》时,高鸿业字斟句

酌,反复琢磨,一天只能译出 2000 多字。译文初稿通常要放置一周或数周后,再从读者角度进行审读。发现难懂之处,再反复推敲,仔细修改。经过如此努力,《通论》重译本也像《经济学》译本一样,语句通顺,行文流畅,完全达到了“达”的境界。这是重译本的一个突出特色。同时,重译本增添部分译者评注,尝试创新学术著作翻译模式,也为重译本增色不少。重译本从 1999 年出版至今,已经重印 7 次。市场已经说明,高译本达到了“信、达、雅”的完美要求,赢得了读者,是成功的译作。这为传播《通论》,普及凯恩斯经济学,做出了贡献。

三、高鸿业解读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

2002 年,高鸿业应山东人民出版社之约,撰写并出版了《一本拯救资本主义的著作——解读〈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〉》(以下简称《解读》)。

《解读》共十六章,大体上包括两部分内容。其中,第五章到第十二章,逐章解释《通论》的重点、难点、疑点和公式推导;其余各章分别介绍《通论》出版的时代、学术和著者背景,评论《通论》在思想、政策和学术方面的影响,分析《通论》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情况等。

首先,《通论》致力于拯救资本主义。^[5]20 世纪 30 年代,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,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灭顶之灾。在此危急关头,以萨伊定律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学束手无策。它们既给不出有说服力的解释,也提不出有效的脱险对策。例如,哈佛大学的熊彼特、伦敦经济学院的罗宾斯,以及美国的欧文·费雪等,依然信奉自由放任主义,主张顺其自然,让时间医治制度的失衡。

作为学者型官员,凯恩斯敏锐地认识到,自由放任机制已经行不通了。他提议,在萧条时期,消费者,尤其是家庭妇女,要尽量多地购买物品;各级政府都要兴办公共工程,如修建道路等。然而,其主张却得不到既有经济理论的支持。凯恩斯意识到,要消除危机,挽救资本主义,关键是摆脱旧学说,创立新理论。《通论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。它解释了这场灾难的原因,提出了消除灾难的方案。因此,《通论》被公认为是一本拯救资本主义的著作,而凯恩斯本人则被誉为资本主义的“救世主”。这也是《解读》在标题中列出“一本拯救资本主义的著作”的原因。

其次,《通论》是适用于各种情况的“一般理论”。^[5]《通论》的核心思想是:国民收入或就业量,取决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。消费需求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;边际消费倾向通常小于 1,并且递减,因而收入中总有一部分被储蓄起来。投资需求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;而利息率又取决于货币数量和流动性偏好。资本边际效率取决于预期收益和市场价格;在通常情况下,资本边际效率是递减的,而利率则不能无限制地下降。由此决定,投资需求往往不足。如果投资量小于储蓄量,充分就业的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有一部分卖不出去,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失业。凯恩斯认为,上述五个变量分别受不同因素的影响,只有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,投资量才完全等于储蓄量。这就是传统经济学所描述的情形。通常情况下,投资量总是小于储蓄量,存在着危机和失业。据此,凯恩斯断言,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和结论(即投资总是等于储蓄)只适用于特殊情况,是各种均衡状态中的一种特例,而他的《通论》则既适用于充分就业的情况,也适用于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,是适用于各种情况的“一般理论”。这是《通论》标题中出现“通论”字样的原因。

按照凯恩斯的理论,消除危机和失业的办法,是扩大有效需求。在上述五个变量中,政府能够控制的只有货币供给量,而实际干预效果又不明显。所以,凯恩斯建议政府直接增加投资。他甚至主张投资社会化。然而,凯恩斯在《通论》中并没有系统地论述其政策主张。相关的政策建议仅以支离破碎的形式散见于全书各处。我们在流行教科书中看到的那些宏观需求政策分析,大都是凯恩斯的追随者,尤其是汉森教授的贡献。

再次,《通论》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。《通论》问世后,拥护者有之,如英国的希克斯、美国的汉森等;反对者有之,如美国的弗里德曼、卢卡斯等;折衷者有之,如美国的萨缪尔森等。由此形成了经济学的左派、右派和中派。他们从各自的学术立场出发,诠释、介绍、批评、攻击、捍卫凯恩斯的经济思想。在这种学派林立,百家争鸣的氛围中,创新观点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,由此推动了现代经济理论蓬勃发展。高鸿业指出,战后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,在很大程度上是对《通论》所做出的反应。^[5]

《通论》的基本观点,是认定市场机制不能自行解决失业问题,必须由国家进行干预,即实行“有管理的资本主义”。这样,在西方经济理论体系内部,就出现了政府干预(左派)和反政府干预(右派)的矛盾和冲突。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中派经济学家,试图调和这种矛盾。他们把传统的自由放任理论和凯恩斯的干预理论机械地结合起来,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。他们自信地宣称:前者是以充分就业为分析的前提,后者则着重研究各种不同水平的就业量的情况。两种理论反映了同一理论体系内部两种不同的情况,因而可以纳入同一体系。

20世纪70年代以前,新古典综合派是有效的。但是,美国出现停滞膨胀后,该理论无法解释其原因,也提不出有效对策,因而陷入严重困境。围绕这个难题,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许多新理论,如理性预期理论、新凯恩斯主义等。尽管迄今为止三派经济学家都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论 and 对策,但人们有理由相信,随着内在经济逻辑的逐渐暴露,经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,会出现另一个“凯恩斯”。

最后,《通论》对我国有参考价值。^[5]高鸿业指出,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这个角度看,《通论》在我国没有多少“实践意义”。但是,从发展市场经济这个角度看,《通论》在我国则有“参考的价值”。例如,在经济运行过热时,政府也可以实施减少投资的“需求管理”。再如,《通论》关于管理股票市场的论述,对我国如何驾驭股市也有帮助。因此,高鸿业建议,对待《通论》,应当和对待一般西方经济学的著作一样,坚持“去其糟粕、取其精华”,以便达到“洋为中用”的目的。

四、高鸿业与《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》的影响

从1944年在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,撰写有关宏观消费函数的学位论文算起,高鸿业致力于《通论》研读、教学、翻译和评论,长达64年之久。他对《通论》内容把握之全面,研究之精深,理解之到位,评论之确凿,国内无出其右者。这是他成功翻译、解读和讲授《通论》的专业基础。

高鸿业在读本科时就被选派到美国驻华空军充任翻译,此后又到美国留学、执教12年。其英文阅读和表达能力不亚于国语。他在民国时期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,中文表达能力堪称一流。这是他成功翻译、解读和讲授《通论》的文字基础。

高鸿业承担重译《通论》项目时已77岁。当时他已经功成名就,没有必要通过出一本译著提高自己的知名度。他珍惜自己的学术声誉甚于生命,这是他成功翻译、解读和讲授《通论》的人格基础。

高鸿业回国后,长期在马克思经济学重镇中国人民大学执教,认真研读了马克思经济学,完整地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三大理论体系。这是他比较《资本论》和《通论》,正确评析《通论》的理论基础,也是那些只懂马克思或只懂凯恩斯的“半个”经济学家难以逾越的。

《通论》以其经久不衰的学术魅力成为传世之作。《解读〈通论〉》也将因《通论》的光辉和著者独有的智慧而成为传世之作。高鸿业曾经因为翻译《经济学》而赢得尊敬,也将因为重译《通论》和解读《通论》而载于经济学史册。如今,在中国的大学里,高鸿业已经成了当代中国经济学无法绕开的名字,并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西方经济学。这或许是他与《通论》毕生结缘的缘故吧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凯恩斯. 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9.
- [2]高鸿业,吴易风. 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(微观部分)[M]. 北京:经济科学出版社,1997.
- [3]高鸿业:西方经济学(微观部分)[M]. 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6.
- [4]高鸿业. 高鸿业自选集[M]. 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7.
- [5]高鸿业. 解读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[M]. 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,2002.

(责任编辑:郝 涛)